



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关系

〔美〕J·F·布朗著

商务印书馆

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关系

〔美〕 J. F. 布朗 著

商 正 郭济祖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年·北京

J.F. Brown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EASTERN EUROPEAN ALLIES:
A SURVEY**

Rand Corporation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U.S.A. 1975

提 要

本书是美国兰德公司出版的一份调研报告，对1968年到1975年期间的苏联在东欧的目标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此同时，又就其双边关系作了扼要的论述。作者布朗是兰德公司的顾问、慕尼黑“自由欧洲电台”的分析研究处主任。

苏联与其东欧盟国的关系

〔美〕J. F. 布朗 著

商 正 郭济祖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1/32 5印张 100千字
1980年2月第1版 198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800册
统一书号:3017·265 定价0.41元

目 录

前言	1
绪论	2
第一部分 苏联在东欧的目的	7
苏联对东欧的看法	7
赫鲁晓夫指导下的实验	10
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调整工作：各种触动因素	18
勃列日涅夫主持下的调整工作：目的和方法	23
全面恢复正统观念	31
团结一致范围内的一种新的独立生存能力？	34
第二部分 苏联-东欧关系最近出现的因素和 发展情况	38
整个地区的因素和发展情况	39
经济因素	39
军事因素	44
政治和外交政策	48
意识形态上的和组织上的党务	51
与苏联的双边关系	55
保加利亚	55
捷克斯洛伐克	66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79
匈牙利	89

波兰	96
罗马尼亚	108
阿尔巴尼亚	119
东欧国家内部关系的各个方面	129
第三部分 型式、结论和预测	138
现实的和潜在的问题	139
苏联国内的问题及其对东欧的影响	144
苏联的继承问题和其他问题	148
文献目录：兰德公司关于东欧的出版物	152

前 言

自从1968年苏联带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面形成以来，迄今未见有何对苏联-东欧关系进行全面分析的著作问世。本报告打算填补这一空白。它调查了1969年以来的苏联-东欧关系，剖析了苏联在东欧的目的，以及苏联为达到那些目的而奉行的政策的成败及其前景。

兰德公司有一项研究项目，对1968年以来苏联-东欧关系的军事和体制方面进行比较详尽的研究，这一工作目前正由A.罗斯·约翰逊主持进行。兰德公司有关东欧问题的出版物已开列在本报告所附的书目之内^①。论述西方盟国团结前景的《西方团结的展望》是一份与此类似的研究报告，现正由霍斯特·门德肖逊负责撰写，不日即可问世。这些出版物所报道的研究工作都是根据“兰德公司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安全问题的空军研究项目”进行的。该项研究工作广泛地考察了欧洲两个联盟体系的现状和前景，其目的在于向那些负责欧洲事务的空军计划人员提供评价资料，使他们了解现有欧洲安全安排中可能出现什么样微小的或显著的变化。

本报告的撰写人J.F.布朗是慕尼黑欧洲自由广播电台分析研究处主任，兰德公司的顾问。

^① 见本书末页。——译者

绪 论

本研究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苏联在东欧的目的，重点在于研究苏联的愿望而不是其实现的程度或实现的可能性。这一部分试图扼要地分析一下苏联对东欧的重要性有什么看法，继而探讨一下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东欧政策和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东欧政策的特点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别。在这样做的时候，它力求明确指出这些差别的原因。

第二部分叙述并分析苏联和它的东欧盟国（包括阿尔巴尼亚）之间相互影响中的最重要的发展，特别着重讨论1969到1975年这一时期。这一部分概括地探讨了整个地区最重要的发展，以及以苏联为一方以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为另一方的双边关系。

第三部分根据第二部分的材料得出结论、格局和概念，评价苏联的东欧政策成功到什么程度，认清苏联在追求这些目的时所遇到的严重障碍，最后稍稍推测一下苏联与东欧之间未来的相互影响。

这种探讨的方法存在的问题是：内容难免有些重复，并且容易使人觉得仿佛是把一个问题的那些事实上彼此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各自孤立地加以论述。例如，在分别地论述苏联的种种愿望时，它可能使人觉得好象苏联的中心计划得到了严

格执行并不断取得成功。但是，与其说是苏联的“中心计划”，还不如说是苏联的“迫切需要”较为确切，并且在执行的时候往往是暂时凑合，而不是审慎地预先安排，这一点非常突出。此外，本报告第二部分论述苏联与东欧之间地区性的和双边的关系中最近的主要发展情况，不仅着重谈到挡在苏联成功道路上的种种严重问题，而且还着重谈到东欧仍用一条名副其实的百衲被掩盖其对苏联政策的内在不满和客观上不易执行这一事实。其实，尽管苏联控制东欧二十五年以上，按照大体相似的方针彻底改造该地区原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并把公开宣称的统一思想强加于人，但是，“东欧”一词本身仍然基本上是为了使用方便而不是表示和谐统一的名称。

第三部分至少有几分是专门想要减少第一、第二两部分所表现出来的把各个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各自孤立地论述的缺陷。它试图把苏联的愿望同显然妨碍其实现的现有和预料的问题作一番比较。最后，它希望会呈现一幅大体上铢两悉称地混杂着目的和阻力、成功和失败的明暗相当的图景，从中可以约略看出苏联和东欧关系的未来进程。

“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团结一致”这一概念是苏联对东欧政策的主要总目标，这个概念在本研究报告中一再论及。在这方面，“团结一致”是指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虽然由于局部条件不同而有某种程度的差别，却存在着对内对外政策的总的一致性以及苏联和东欧各自执行这些政策的同类机构。再从苏联的观点来讲，“独立生存能力”将被解释为东欧各国某种程度的自信、可靠和效率，这些性质将不断地使那里的共产党统治正统化，从而减少苏联忙于对该地区采取预防措施

的必要。

这一概念提供一个可以把全部讨论内容放进去的框框，并为以后的叙述提供有用的助力。我们在研究苏联的东欧政策的目的之后可以推断，团结一致和独立生存能力（或具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团结一致）被当作苏联的必要条件或政策规定。它们是互相补充和互相影响的必要条件，按照苏联的目标来说，这两个必要条件是容不分开，更不必说可以被看作互相排斥的了。两者不应当单独存在，两者应当协调地、和谐地联系在一起。然而，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苏联-东欧关系却已表明——并且我们希望这份研究报告也会表明——苏联旨在把团结一致和独立生存能力保持平衡的企图已经成为苏联在东欧处于“困境”的根源，今后也可能仍然如此。事实上，我们至今获得的证据倾向于说明，这两个目标不是互相影响和互为补充的，而往往是在实践中互相矛盾和互相排斥的。

例如，独立的生存能力在五十年代后期、特别是六十年代初期确实开始有所发展，但是按照苏联的观点来看，它使得团结一致的精神很难维持下去，更谈不上加强了。苏联领导集团自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一直想强加给东欧的那种团结一致的精神，根据至今所掌握的证据来看，似乎不会象苏联人希望独立生存能力成为平衡发展的共存体那样的程度得到充实。

未来的事态也许最后将证明，这两个概念是不能并存的，团结一致精神确实排斥独立生存能力，反之亦然；这种共存体实际上是一种幻想。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其原因就在于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之间缺乏利害关系的任何根本的关联或共

同性，这一状况固然会容许东欧国家享有为其独立生存所必需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以及为其自发的变革倾向所必需的自由，另一方面却依然维持苏联人认为其盟主地位所必不可少的那种程度的团结一致。

上文已经指出，在1948至1968年期间，苏联领导人和东欧若干领导集团——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集团——已经用迥然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团结一致和独立生存能力之间的关系，并因此导致了严重的不团结现象甚至危险的不稳定状态。这方面另一个有关的因素是苏联和东欧国家领导集团内部各个阶层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例如在苏联，甚至在赫鲁晓夫于1957年战胜了“反党集团”之后，人们还会设想，纵然赫鲁晓夫认为有必要实行试验和创新以促进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东欧，也仍然有人反对的。在1968年，领导集团中间对于如何处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问题肯定有意见分歧。苏联的一些经济和技术知识分子欢迎过六十年代东欧的经济改革，他们现在也许还希望那些改革在东欧和他们本国重新出现。在非俄罗斯民族的加盟共和国，有些阶层——固然不一定是高级领导层——会欢迎东欧民族自主权的增长，希望借此推动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同样发展。

在东欧，情况甚至更加复杂和各有不同，这主要是由于该地区的国家各有特点并有时候存着彼此抵触的愿望。即使那些从苏联的观点来看最听话的东欧领导人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顺应这些民族愿望，至少在斯大林逝世以后是如此。不大听话的领导人走得更远，以致肯定已经同苏联的团结一致

概念发生了矛盾。每一个领导集团内部对于应该争取的自主的程度如何，也有意见分歧。关于国内政策，保守派和改良派往往公开发生争执，主要是关于一些直接影响团结一致精神和独立生存能力之间平衡的问题。

尽管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令人感到难以应付，它却并不一定有损本研究报告所用的“团结一致-独立生存能力”这个框框的实用价值。它确实表明的一一以及本研究报告旨在阐述的一一是，既然各个东欧国家自觉地要求得到国际、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进展，苏联在使它对东欧的政策原则与东欧国家上述要求相调和时便遇到了一大堆问题，并将继续如此。到目前为止，为解决这些问题而作出的种种努力无论从苏联的观点来看还是从东欧的观点来看，都没有使团结一致精神和独立生存能力达到令人满意的和谐程度，反而造成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的反复循环的转变。尽管苏联作出种种努力，这种双方都不满意的状况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而如果这些转变变得过分剧烈，还会在转变过程中突然在东欧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第一部分 苏联在东欧的目的

苏联对东欧的看法

在苏联看来究竟东欧有多么重要，这不是单凭一个因素可以说清楚的。的确有不少因素(其中有些是互为作用的)可以用来说明三十多年来为什么苏联对外政策优先考虑的最重要的课题也许就是如何保持和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然而已经发生变化的是，苏联先后几个领导集团在任何特定时期对这些不同因素有其重视的侧重面。

这些因素可以简单扼要地概述如下：^①

军事安全因素。 对苏联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东欧的控制意味着取得了一个缓冲地带，以防西方国家可能的进攻。紧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冷战时期，这个因素大概是苏联领导人首先考虑的问题，在现今一些领导人、特别是军事领导人的心目中，它可能仍然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然，在这三十年中，战争的方式和技术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在

^① 下面一些分析依据理查德·洛温撒尔“改变中的苏联政策及其所关心的问题”一文，见《苏美关系和世界秩序：两国和多国》(阿德尔菲论文集第66号，伦敦战略研究学会1970年3月版，第11—23页)。这项分析工作还受影响于弗里茨·厄马思所著《国际主义、安全和合法性：对苏联在东欧利益的挑战，1964—1968年》(RM-5909-PR，兰德公司，圣莫尼卡，1969年版)。

核武器时代，东欧缓冲地带的价值远不如从前区域性常规战争时代那么重要。然而，甚至在这个新时代，苏联关于核战争的军事设想还显然强调欧洲地面部队的重要性，而在有限的常规战争的情况下，地面部队的价值当然更不待言。总之，苏联今天仍旧在东欧驻军三十一个师，远远超过任何警察任务可能需要的数量，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他们是多么重视东欧这一安全地带的。

跳板因素。 在这方面，受苏联控制的东欧被看作一个基地，用来对西欧或其若干部分、特别是西德进行军事侵略或施加政治影响。当然，这个假设是否正确，已经引起激烈的争论，只要有人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个假设，他就受到有力的责难，哪怕这种责难只有几分道理甚或准确性。可是，纵然对柏林的封锁归于失败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以后苏联领导人越来越感到不容易采取武装侵略西欧的办法，几乎没有什么人会否认，以保持东欧现状为基础的对西欧的政治渗透和外交上对它的控制仍然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各时代苏联国际政策的重要目标。

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因素。 从扩大意识形态影响的观点出发，苏联人把东欧看作同苏联一起推进世界革命过程的共产党国家的先锋队。这种信念无疑地在赫鲁晓夫的思想和政策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完成苏联以世界革命为其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的对外政策方面，东欧负有特殊的任务，因为该地区的执政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要起重要的模范作用。

意识形态方面的安全因素。 这是理查德·洛温塔尔提

出的一个概念，^①它意味着苏联领导集团目前在力求使其关闭的政治制度免遭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治渗透方面大部分处于守势。在这方面，与其说是把东欧看作军事缓冲地带，还不如说是把它看作意识形态缓冲地带；因此就有必要加紧对东欧的控制，并尽可能把相类的正统政治制度强加给东欧各国。使苏联感到进退两难的是，缓冲地带也是共产党改良主义思想滋生的沃土，而这种思想比任何可能从西方渗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来得危险。显然，对东欧的这种看法在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来说是很突出的。

显而易见，这四个因素中的一些因素已经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三届苏联领导集团的决策，同时其他因素却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来说，军事安全因素在他们对东欧的重视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跳板因素所起的作用也差不多，虽然关于它在特定时期所占的比重如何，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把东欧看作军事侵略的基地的观念是另一个问题：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这个观念在过去二十五年期间已经失去了它的大部分的 意义。但是，作为政治渗透和外交控制的基地，东欧在苏联人的心目中仍然保有它的价值。感情容易冲动而又颇有自信的赫鲁晓夫至少部分地是透过意识形态的三棱镜观察世界政治的，这种倾向并没有使他不 去破坏西方的制度或利用其种种弱点，而倒是使他加强了这方面的努力。以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来说，对内采取守势和对外采取大胆行动是同一事物的两个

① 见前引“改变中的苏联政策及其所关心的问题”一文。

不同的方面。因此，竭力要求建立欧洲安全体系的目的并非单纯是想用合法手段保持现状，虽然这可能是主要的动机。正如苏联的政论家所公开强调的那样，其目的在于促进西欧的有助于社会变革的形势沿着苏联所赞同的方向发展。^①

在考虑上述第三和第四因素——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安全因素——时，情况证明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连续性；但是从研究苏联-东欧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因素是最为直接有关的。它们反映了为方便起见可以称之为赫鲁晓夫对东欧的时代和勃列日涅夫对东欧的时代之间的差别。赫鲁晓夫对东欧的颇有自信的“国际主义”观点至少可以部分地说明他是准备实行试验和变革了。与此相反，勃列日涅夫的“意识形态不安全感”或多或少有助于说明苏联近来为什么要坚持加紧控制和在国内强调正统观念。由此可见，根据我们概括地观察苏联政策的结果，这种对东欧的大不相同的看法已经直接影响了所用的方法、所规定的优先考虑事项，以及这两位苏联领导人在比较狭隘地安排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直接关系方面所遇到的困难。

赫鲁晓夫指导下的实验

撇开残暴和恐怖的特点不谈，斯大林主义体系在东欧主要想推进两方面的革新：在国家一级强行扶植莫斯科所信任的领导集团，在国内方面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改造，借以为未来

^① 参阅查尔斯·安德拉斯：“欧洲安全和‘社会进步’”（自由欧洲电台研究和分析部背景材料报告，1975年7月21日）。

的社会主义发展奠定基础。^①

这里所谓国家一级，是指苏联和东欧有关国家通过政府、政党、军事等渠道而产生的关系；所谓国内方面是指各个东欧国家的政府、政党等统治核心与有关社会的关系。这两方面的关系显然决不是互相排斥的。

自从斯大林去世以来，苏联在东欧的主要目的似乎是想要实现团结一致和独立生存这两者的正确结合。然而，在他去世后四年左右的期间，苏联并没有前后一致的东欧政策，主要因为莫斯科领导集团内部有意见分歧，并且看不到那种不仅需要采取治标办法而且需要采取治本办法的实际情况。这种实际情况在1953年比尔森和东柏林的暴乱中几乎立刻就可以看出来。苏联的反应是开始实行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让步，这两方面的让步合起来叫做“新方针”。^②然而，这些让步基本上是对斯大林留下的不稳定局面的反应，而并不表明莫斯科关于怎样治理东欧国家的问题可能有什么崭新的想法。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赫鲁晓夫于1954年对中国以及1955年引人注目地对南斯拉夫作了修补篱笆的访问。至于莫斯科在东欧的其他盟国，苏联对其中某些国家的领导集团进行了大量的干预，力图确保它们在国内享有更牢固的合法地位，但是很难说这些措施合起来能够构成“新体系”这类的东西。

事实上，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所以发生暴动，是由于斯

^① 论述苏联-东欧关系的最卓越的著作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团结和冲突》（哈佛大学出版社，坎布里奇，1967年版）。

^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方针”实际上是在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骚乱之前的几天宣布的。但是在骚乱以后进一步宣布了经济让步。

大林的体系缺乏生命力，也由于没有建立基本上新的体系以取而代之。1956年以后，赫鲁晓夫想要设法纠正的，正是这种缺陷。在发生匈牙利革命和波兰暴动的一年之内，他的领导地位在苏联得到了承认和巩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团结一致的表面现象，他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在东欧建立一个新体系这样的任务了。

赫鲁晓夫试图在东欧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生气勃勃的体系以及他在这方面只取得了部分成就的情况，至今已为众所周知，用不着在这里一一提及。^①以刚宣布的指导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平等原则这一理论基础为背景，赫鲁晓夫把华沙条约组织、特别是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这两个机构当作工具，用来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以及在东欧国家彼此之间建立一种崭新的、较为坚实的团结一致的局面。可是，赫鲁晓夫比他的继任者更强调苏联目标所要求的独立生存和团结一致的方面，而比起他的前任来就强调得格外多。我们现在无从断定他或他的顾问们是否有意识地认为独立生存的能力愈强就愈加能够团结一致，还是他认为两者之间没有辩证的或其他任何性质的统一。我们也无从断定赫鲁晓夫究竟有没有成竹在胸。也许他比大多数领导人更倾向于依靠若干必需的初步(但通常是合理的)打算，然后依靠一些信手拈来的、特定的(有时是不合理的)手段力求加以贯彻。然而，不论他的概念化过程多么不够完善，也不管他实行的方法多么想入

^① 参阅弗朗斯瓦·费伊托：《人民民主国家史：斯大林以后的东欧》(弗雷德里克·普雷格书店，纽约，1971年版)。并参阅J.F.布朗：《新东方：赫鲁晓夫时代及以后》(弗雷德里克·普雷格书店，纽约，1966年版)。